



97岁高龄的张金哲院士，至今还每周出2次门诊，每天出现在医院老行政楼办公室。

北京儿童医院 张金哲院士 做儿科医生 是伟大的光荣

儿童和青少年是早晨升起的太阳，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作为儿科工作者，我们的任务是保护年轻一代茁壮成长。但是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们强调的“服务”精神，被资本主义思想冲击，影响了儿科医生的价值观。

资本主义思想冲击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人民都怀揣建设新中国的巨大热情，那时没有人去谈论、去比较付出和收入是多少，只考虑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中。

改革开放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窗户打开了，难免会有个别苍蝇飞进来捣乱。受到一些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很多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包括从事儿科的医务工作者，大家越来越发现，儿科投入多风险大，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再与国外医生相比，心理更加不平衡。很多人会想，既然都是治病，为什么非得治孩子？

儿科风险大、收入少，确属事实。20世纪80年代，小儿看病都是减单，医生的挂号费也才几毛钱，比医院旁边的公共厕所收费还便宜。但没有医生抱怨。

现在医生的服务态度与过去不一样，所以家长对医生的态度自然不一样，这种矛盾是双方的。医生少、时间少、患者多，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

教家长“看病”

我也遇到过“纠纷”。通常都是孩子没病，但患者家属坚持认为“有病要看”。他们觉得来一趟医院，医生不开药、不打针，几句话被打发了，不能理解。遇到这样的患者，我就得让他承认“没病”，这就

得从教他“看病”开始。

最常见的是腹痛患儿。有一次，一位患儿家长带着腹痛的孩子找到我，我问：疼多久？家长说：几分钟，最多十几分钟。我问：有超过2小时吗？家属说：没有。我又问：疼完之后吃饭、玩要有影响吗？答：正常。我就摸肚子，从肚脐下方手指并拢摁下去，摸到跳动的腹主动脉。

我让孩子家长学着我的样子，感受腹主动脉的跳动。我告诉他，你这就从肚子“前墙”摸到“后墙”了，说明没事。如果有肿块或者其他肿痛，就不可能摸着腹主动脉。

家属服气了，满意了。他离开之前，我再把口袋里的小纸条，送他一张，上面写着应对肠痉挛腹痛的基本方法。

我告诉他：“你拿着它，下次到别的医院，可以给大夫看，就说是儿童医院一个老头儿给你的。”你给家长这个，说明医生是有准备、有经验的，你让他拿给别的医生看，说明这个医生是有把握的。他觉得你有把握了，他才放心。

做一名医生，尤其是儿科医生，每一次出门诊、做手术，都要有所准备，必须从主观上想着要为患儿和家属做点什么，要有意识地去“服务”。但是从我到儿童医院60年，这一套办法没人学。

医患尊重是相互的。以前出门诊，医院要求当患者进入诊室时，医生必须站立，先请患者坐下，医生才坐下，开始问诊。现在这些礼节都取消了。

但是无论什么时候，作为一名医生都必须要有奉献精神。我们的职业任务，我们的职业价值，我们从中获得的职业地位，不能以经济收入来衡量。这是我们伟大的光荣，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的。

(整理 陈惠)



198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寄生虫学教授保罗·巴茨（中）来访，在陈灏珠院士（左）家中与其合影。

一次救治外宾的经历

▲ 星岩

作为我国著名的心血管病专家和医学教育家，中国当代心脏病学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陈灏珠教授，如今虽已92岁高龄，但仍然活跃在临床、教学一线，在不少会议上仍会看到他的身影。

谈起与患者之间的故事，陈灏珠对于20世纪70年代救治一位外宾的经历记忆犹新。

一个紧急的通知

1975年4月22日，陈灏珠接到紧急通知，一位在无锡访问的外宾突发急性心肌梗死并发严重室性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生命危在旦夕。该患者是中美建交后由美国科学院派出的第一批访华代表团——血吸虫病代表团副团长保罗·巴茨博士。原卫生部下令由上海组织最好的专家前往救治，陈灏珠责无旁贷。

一场自信的治疗

但1975年，当时中美两国中断交往20余年，还没有建立起足够的信任，遂提出立即从美国派专家来负责救治。作为医疗组组长的陈灏珠婉言谢绝了美方派专家来华主持抢救的要求。他说：“请放心，我们有把握尽快使患者脱险。”

20世纪70年代，还没有今天治疗急性心肌梗死的诸如“溶栓治疗”“介入治疗”等比较有效的方法，只能根据临床经验采用对症治疗和细致入微的监测和护理。陈灏珠强调：“任何病情变化都不能忽视，既定的治疗方案不能轻易放弃，工作落实到人，做到万无一失。”陈灏珠更是不眠不休地守护在患者身边，和同事一起监测心电图、呼吸和血压。

第二天和第三天，患者都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陈灏珠等临危不乱。通过强心剂、利尿剂等一系列措施，最终，患者左室心力衰竭和心包炎的并发症得到了控制，患者也在度过了病情最为危重的一周后，转危为安。

除了日常治疗外，陈灏珠还不忘与患者家属以流利的英语进

行交谈，勉励家属与患者一起渡过难关。

一份深厚的友谊

病后第16天，陈灏珠决定将已经进入康复阶段的巴茨博士送往具备一切抢救设备的疗养院继续治疗、休养。而巴茨博士希望陈灏珠能够同行，继续陪伴他一段时间。因此陈灏珠陪同巴茨博士来到太湖之滨的华东工人疗养院，开始休养治疗阶段。

巴茨博士的一场大病，使他与中国医生陈灏珠相处了近一个月，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巴茨博士康复回国后，很快恢复了工作，后被聘为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在他健在的时候，每年都要给陈灏珠寄一张全家福照片。而陈灏珠每次到美国出席学术会议或学术交流，即使日程安排得再满，也要寻找机会去探望巴茨博士。这就是两个医学家之间的情谊。

一个崇高的评价

1976年第136卷美国权威杂志《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内科学文献)刊登了美国著名心脏病学专家Dimond E.G.教授的特别评论：“事件的发展是一件国际外交、标准治疗、外国建议和愉快结局的综合。中国医务工作者纯正的热忱，良好的愿望和他们的献身精神，提醒了我们，不论政治制度如何，这些品质是可以而且应该坚持的。”

陈灏珠以自己的自尊自强与高超医术，不但收获了一份难得的友谊，更为祖国赢得了尊严，赢得了荣誉。

我与患者共成长

仁
爱

